

“秀句兼丰功 辉映民国史”

——忆 杨 沧 白 先 生

陶 道 恕

我在童年时代，就常听父辈讲述杨沧白先生对民主革命
的贡献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1939年冬先生还蜀后，我才有
亲承教益的难得机缘。在先生去世前两三年中，我常去他处
看望求教，也常通信。先生去世后，我把先生一些书札和手
迹装裱成卷、册。先生的书法和艺术，曾被何鲁先生誉为
“得晋唐遗韵，近三百年来，很少人能和他相比。”这些墨
宝，可惜在十年动乱中散失。在我的印象中，先生既是为创建
民国立下丰功的革命元勋，又是著作等身，誉满海内的诗坛
高手。于右任先生纪念先生的诗句有：“秀句兼丰功，辉映
民国史”①，这是对先生一生最全面、最准确的评价。

“密加同盟，缔造艰难”

先生早在清末时就与先父“订交”，曾亲笔重书《与陶
天倪订交书》一通相赐。1940年初，先父去世时，先生在
《哀辞》中，赞誉先父是“三巴奇士”说明相知甚深。《哀
辞》对先父秘密参加同盟会，在保路同志会兴起时，奔走忘
食，慷慨捐输家财，积极从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作了概
说。当时先生同先父都强烈地意识到：只有认真进行武装起

义的准备工作的，才是革命的头等“正事”②。先生与先父对革命的关键问题，在认识上如此契合，他以“三巴奇士”称许先父，就是明证。

先父自1922年与先生在上海分别后，1932年虽重晤于沪上，但为时很暂，因而先生看来，他与先父仿佛已经阔别多年。1939年先生返渝，初寓领事巷，先父时住冷水场，因心脏病剧发，无法去与先生相见，只得殷勤致意。不久，先生移住南岸大石坝，特到冷水场作十日之游。老友重逢，畅叙平生，快慰之状，难以用文字形容。不料先生还城不久，先父遽尔作古。先生又亲临赐吊，撰制挽联、哀辞，情意至为恳挚。挽联云：

廿年别最苦相思，垂老耽吟，幸获余生饱忧患；
十日留旋惊不起，长愁养病，意曾忍死待归来。

“廿年”、“忍死”二句，尤为沉痛。先生自出蜀至还蜀，突未届“廿年”，挽联是举成数。可以想见“相思”之既“最”且“苦”，而先父“忍死”相“待”，其情就更加悲苦了。由于我的请求，先生生前曾面允撰写先父墓表，不意两年后先生忍归道山。铭幽未成，抱恨无穷。

“仁人不出孰霖雨”

先生1905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即偕向先乔等应叙永中学堂之聘，初任教习，继任监督。先生不仅在学生中秘密发展同盟会员，还与川南同盟会员会合，积极支持熊克武、黄树中（复生）等秘密制造炸弹，为起义作准备。先生当时的赠人诗中，曾艺术地表达了他救国救民的抱负：“浊世昏昏半梟虎，仁人不出孰霖雨④”。正是这种“霖雨”救苍生的思

想的鼓舞，先生后来敢于身犯万难，自始至终坚定不移。晚年初衷未改，在重庆“观日出”作歌：“偶将温煦照万物，每与霖雨苏疲农”⑤此两句实是早年宏愿的再一次抒发，决非偶然写成的景物描写之作。它与杜甫“广厦万间”、“大庇寒士”的情怀，是多么合拍。

不久，先生转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任教，常与省中及外地党人秘密计议，还带头到督院衙门请愿，为学生伸张正义，先生因得广交省会名流，而与达县刘士志先生相交尤笃，曾撰长诗《悲歌赠刘士志》，抒发了自己的革命激情。

先生的革命活动，在重庆府中学堂任监督时期尤为突出。当时，同盟会重庆支部系秘密设在校内，先生是主盟人，故该校师生同盟会员特多。学监张培爵即后来蜀军政府的都督。在辛亥起义前，发展组织，联络会党，周旋官府，运筹财政，定议决疑等事集于先生一身⑥。在1911年重庆蜀军政府创建的全过程中，先生实际上起到了组织领导的核心作用。但先生功成不居，仅接受政府顾问的名义。他曾写道：胜清昔云季，武昌兴义师，呼应纷独立，蜀起西南陲。余亦从张公，渝州揭义旗⑦。高风亮节，洵堪钦敬。先生曾特为我追述重庆府知府组传善对先生革命活动已有查觉，先生与他舌战，及重大起义之日，他与张培爵亲率义师会集朝天观，挟清朝官吏投降，剪辮、缴印，当游街时组传善死死挽着先生的手不肯放松的情景。谈罢并放声大笑，使我犹如身临其境。先生用他最擅长的表达艺术，为我再现了当年蜀军起义时威武雄壮的场面。

“不恤吾家痛，但冀我国肥”

重庆蜀军政府成立未久，即与成都大汉军政府合并。接着就有1913年“癸丑讨袁”之役，蜀军政府成立时，先生谦退为怀，本来隐身幕后，这时却义无反顾地走出前台。他与熊克武实行“军民分治”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任民政总厅长。重庆发难讨袁，是响应赣、宁的义举，先生实为主谋。军兴不到四十天，即告失败，先生遂开始了艰险的亡命生涯。先生曾为我回顾亡命的经历，后读先生“违难纪事”的五言长诗，才知道这些经历在诗中都有翔实生动的描述。

《纪事》诗长达二千字，在写法上把杜甫《北征》、《壮游》的艺术经验熔于一炉，字数则大大超过了杜甫的原作。除此之外，《纪事》诗还出色地吸取了汉魏六朝乐府艺术表现上的优点，从而使它显示出为先生所独有的艺术风格特色。历史上的政治家和革命者，兼具文学才华的极少。先生以“我手”写自我革命生涯的艺术长篇的问世，在诗史上实为罕见。长诗首述辛亥蜀军起义成功及袁世凯“妄希”、“帝制”，癸丑讨袁的经过。长诗的重点是详细描写了事败脱险经历：幸有“两全”相助，法国神父“扶持”，“易服”、“阴从隧道出”城，潜至教堂。“晚”渡南岸，宿鸡冠石，明晨登舟，途径长寿、涪陵、龚滩、彭水至酉阳，神父始返。“入湘”后循水道经里也、桃源抵常德，读“邸报”始悉名在“逆首”。因严“曳”、“查拏”，只得“敛匿”、“昼伏”。继写过洞庭，赴汉皋，化装“水工”，平安到沪。“旬日”又“东去”日本的惊险旅程，赖友资助，“举

家浮海”，亲人团聚。“夜深”、“听”老亲追述逃亡中所遇“险灾”。长诗以“蒙难而艰贞，报国当有时，不恤吾家瘠，但冀我国肥”⑧等句作结，是先生反袁到底，决不回头的坚定信念的艺术表达。长诗从人物刻画、情节安排到细节描写，都以鲜明、曲折、生动取胜。时还插写自然景观，也以优美清新引人入胜，很富于人情味，也饶有幽默感。先生历经艰难险阻，却无改救国杀贼意愿。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在长诗中得到充分表现。诚如于老所评，此诗确实是“辉映史册”，值得大书特书的不朽篇章。由于出自辛亥蜀军起义的创始人和癸丑讨袁的发难者之手，更增高了它的艺术价值。先生曾多次吟诵其中精彩片段，自谓是他“生平第一”佳作。“书史千秋重”⑨，这是先生还蜀前的名句。《纪事》诗无疑就是先生诗集中能够永垂书史，见重千秋的力作。

“燕云痛长割，徒劳百战功”

讨袁失败，先生亡命日本江户，旋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冬循孙中山先生指示，与陈其美等赴南洋募饷，旋在上海策动肇和兵舰起义。1916年第二次讨袁成功，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继而有“护法”之役。1918年先生出任四川省长，1920年辞职。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重建海陆军大元帅府，先生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长，次年任广东省长。后因受蒋介石排挤，乃愤而离职。孙中山先生发表著名《北上宣言》后，为实现孙、段、张三角联盟，经孙中山先生同意，先生接受段祺瑞组阁之邀北上，先任农商总长，未就职，继改任司法总长。数月后就职，在北平定居。直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才迁居上海。以后先生以“党国元老”身份，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但先生却视如草芥。每当回忆在粤往事时，先生总要提到声讨陈炯明叛变时所做的大量说服争取滇军将领的工作，完全出自维护孙中山先生的威望，壮大革命力量的目的。但蒋介石在一次“通电”中，却进行人身攻击，诋毁“有人挟滇军的自重”，意在离间孙、杨关系，以实现其个人野心。先生不能接受，遂愤而辞职。先生说：蒋介石一向对我很尊重，称“老师”而不名，曾“误认为死生患难之交”，谁知“一旦反目，狞恶至不可堪”，“视故旧如仇讎”，“淆乱是非至于如此其极”^⑩。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狰狞面目，终于在“四·一二”后暴露于天下。而先生洁身自好的高尚品德，更受到人们的敬重。

“九·一八”事变中，蒋介石放弃东三省，卖国投降行径，进一步暴露了他在敌人面前奴颜婢膝的嘴脸，遭到人民唾骂。“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松沪英勇抗敌的爱国行动曾受到先生的赞扬。终因蒋介石与日本妥协，强令“退师”，以致助长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先生为此愤慨万分，曾写诗表达了他的爱国激情：“似有三冤字，徒劳百战功。”以岳飞被迫班师，含冤莫白，比十九路军被迫调往福建，并为他们“徒劳”百战，未竟厥“功”，深表惋惜。他把东三省沦陷比作“燕云”、“长割”，尤感“痛心”。“神奸也未雄”^⑪句，更是针对蒋介石而发。他指责蒋介石善弄权术，工于“奸”诈，口头上以“英雄”自命，实际上毫无一点中国人的骨气。

“老宁轻不命轻名”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叛国，并在南京成立伪组织。一时沪、宁等地不少人甘充汉奸，投靠敌伪，乞求一官半职。对汪的逼胁，先生严词拒绝，并写著名的五律诗，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坚定爱国立场。诗中“风前几垂柳，海上一孤松”⑫一联，上句是对向敌伪摇尾乞怜的软骨头的最好勾勒，下句是对自己傲霜耐寒，挺立不屈的劲节的生动写照。此诗在成渝等地，曾经广为传诵。

出于警惕敌伪劫持、暗算的安全考虑，先生毅然决定秘密经海道赴香港，再转重庆。先生曾讲到了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航行途中一个重要插曲：快抵香港时，忽在船上碰见汪精卫老婆陈璧君。陈身着男装，身后跟随便衣特务，与先生点头招呼。因海轮航行地段已非汪伪势力范围，故陈未敢贸然加害先生，但先生此行却是很冒风险的。先生离沪抵渝时，曾有“老宁轻命不轻名”的著名诗句。先生老来宁轻性命，也不轻名节实为正气凛然，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先生视保存名节，重过爱护生命的高尚情操，同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为自由宁可抛去生命与爱情的著名诗句，思想感情何等相似。先生只身还渝，亲属仍悬隔海上。1941年8月先生忽有悼亡之痛，赋诗逾百首，极情至词工之妙。先生晚年集国忧家难于一身，人虽返回故里，却无家可归。悼亡刚届周年，遽于1942年8月6日以急性肠胃炎逝世，亲故莫不深悲痛惜。我曾撰挽联表达哀悼之情：“死别已吞声，苟令伤神终隔岁；来归仍作客，杜陵垂老竟无家。”

先生自1906年起，历在叙永、成都、重庆任教，为英文“教习”。门下桃李，不少人既是早期同盟会的中坚，又是国内著名学者。先生不只在英文学习上为他们奠定了坚实基础；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广转精深的造诣，尤令他们叹服。胡展堂先生曾称赞先生“言语妙天下，文章到古人”^⑬，绝非溢美之誉。先生诗文集以“天隐阁”命名。早在“九·一八”前，已“成诗千数百首，命弟子书录成集”，却不肯“刊行”，尝有“造述由己，传流在人”^⑭的达言。先生定居上海后，集稿增多，复有自选集，则由右铭世兄手录。先生赴难抛家还蜀后，国难愈加深重，民生日益多艰，“每感时抒怀，特富吟咏”^⑮，诗风进入一崭新阶段。“庾信文章老更成”，识者咸谓可以颉颃杜老。先生逝世后，门生故旧集录《天隐阁诗》逾二十册。解放初由向先乔亲交但懋辛送北京，拟由民国革中央出版，惜未实现。

文成百感集毫端

先生逝世已整整半个世纪。回想亲觅先生教益时，我还是一个青年，如今却年届古稀。回想早年曾得先生奖掖“灯前间与看诗赋”的情景，历历在目，真有恍如隔世之感。1941年先生见怀之作，至今记忆未忘：

苦忆陶公子，归山久不来。清言谁与共，流落始堪哀。

颇复婴忧疾，嗟余忍废颓。生平仲谋感，继述早相推^⑯。

本年，我正在南岸一所中学读书，学校与先生寓居的“青阳别墅”为邻，故能常去侍谈。有一次先生因我归乡数日不来，清言无人共，而苦忆不已，特撰诗见怀。诗末以孙仲

谋相推许，期望极为殷切。五十年来，我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我在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近四十五年，所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能有集中精力，重理旧业的较好条件。十二年来，因忙于教学任务，虽不断有朋友相促，写点追忆先生的文字，却直至今今天才有机会落笔。我在先生心目中，既是“弱龄失怙”的“通家子弟”，又是晚年收纳的及门弟子；可说是厚爱有加。遗憾的是，先生对我推许甚高，我的成就却离先生的期望尚远。每念及，常感惭愧。这篇短文是我多年来蕴藏心中的真情实感的流露，伸纸命笔之际，不觉百感丛生，交集毫端。实则是对先生的革命生涯和文学造诣，即于老所说“丰功”与“秀句”之我见。

① ⑬周开庆：《杨庶堪先生的生平与功业》

②杨庶堪《天倪居士哀辞》：“觥觥陶子，三巴奇士”。“保路事起，奔走忘食”。“密加同盟，缔造艰难”。“慷慨捐输，千金不吝”。

③向楚总纂《巴县志》卷二十二《蜀军革命始末》：“庶堪笑曰：‘君（朱之洪）此去，蒲罗诸人恐未足与谋，吾与閬士方有正事也’。

④⑤⑩⑪⑫《赠李锦湘茂才》、《巴山观日出歌》、《致廖仲恺书》、《闻十九路军退师有感》、《怀孝恕》

⑥⑭赖肃：《杨沧白先生行状》

⑦⑧杨庶堪：《癸丑违难纪事二百韵》

⑨⑫杨庶堪：《新号》

⑮向楚：《杨庶堪传》

辛亥巴县保路同志军

占领重庆老关口

——访四川保路运动义军参加者傅渊希先生

周 仲 初

一九一一年四川发生的保路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铁路主权和清王朝卖国卖路开端，发展成为全川范围的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专制统治的武装起义。它以加速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的历史功绩彪炳于史册。孙中山先生指出：“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这个评述非常正确，肯定了四川保路运动在辛亥革命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保路运动，又是保路同志会、同盟会、哥老会三股力量在四川革命中的总汇合，他们所起的作用虽有不同，但在同盟会领导下的革命方向是一致的。这场运动以磅礴的气势，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的反动专制统治，敲响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丧钟。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志。

巴县同志军起义前的准备

巴县同志军起义前的1909年（宣统元年），各地虽没有团练的设置，但却有团操的出现。所谓团操，是指巴县的每一个乡村，不论是不是袍哥，只要是壮年、青年，都喜欢邀约在一起操演武艺，一般叫团操。在巴县园明乡、福寿乡、白市驿镇等乡镇操武功的人，大都是参加袍哥的。习武的地方多选在庙宇内，因那里宽敞、幽静，是演武之地。操练的军器有：春秋刀、南阳叉、矛子、杆子、花枪、刀、铜棍、剑等。操法大体两种：一种不用军器，在晚间站“骑马式”，打起“点子”（用鼓槌敲鼓边）而站，以燃香计时；一种是使用军器操演，操演时要打锣击鼓，从操演开始直到操完。至于操演何种军器，系由教练提调。教练把军器先摆在演武场上，吩咐每人依次上场操演，如有错误，待操毕后由教练示范改正。园明乡的教练是重庆巡防军哨官（等于排长）余镇海。他教练得很好，是由园明乡的袍哥派人去与重庆同盟会党人联系后，串通巡防军的袍哥聘请来的。这一事实，说明当时四川的袍哥已经打入清军巡防军内，几乎在每队中都设有袍哥的公口，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实际上是起义前的武装训练，这对后来起义起了重要作用。

1911年（宣统三年）春天，当时傅渊希（四川保路运动起义军参加者，现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年已95岁）才15岁。傅的父亲在乡场码头当管事（袍哥五排），一日，突然拿来一本誉本“海底书”（相传此书原本系郑成功在台湾时藏在船底，后传送回来，故名海底）交给傅渊希，要他誉写一本，叫码头的袍哥兄弟念熟后，到福寿乡观礼。原来，福

寿乡“仁号”堂口的冉炳之，是在重庆同盟会党人杨沧白、朱之洪、朱必谦等直接领导指示下开展革命活动的，负责巴县的武装暴动。冉大爷为了发挥各乡场的袍哥力量，特别在码头上大搞“开山立堂”，目的是把各码头的袍哥势力集聚起来，待机而动。

是年农历5月13日，傅渊希也参加了袍哥。因为这个日子是“单刀会”。而每年“单刀会”都要新进一批袍哥。到了11月19日（农历9月28日）那天，福寿乡冉炳之派人送来一道命令：“现在四川各县的同志军已纷纷起义，响应荣县的独立，责令园明场李心田（“仁字”堂口的大爷）克日成立武装一队，占领成渝道上的老关口，以掩护重庆独立。”李大爷奉令后，当即将日常操练的袍哥队伍编成一队，李自任队官（等于连长）。园明场共编足两排人，第一排哨官张恩普；第二排哨官傅载阳；其余一个排由李大爷派人去补充，各排均在老关口聚齐。当傅载阳喊全街人剪去长辫时，傅渊希带头剪掉了自己的长辫，然后拿一把锋利的剪子，从街头剪到街尾。

次日傍晚，由李心田队官率领全队经双合场、马家桥、罗家垭口、刘正恒家大院、手爬岩、茶店子等地，由侧面登上老关口。半夜时，巴县福寿场郑甫臣所带领的一哨人马亦已到达。接着，李心田队官给全队揭示敌情，授予任务。他严肃地说：“重庆还没有独立，浮图关尚有清军把守，但清军中多半都是袍哥兄弟，我们早已接洽好，只要我们兄弟抢先一步登上老关口，助他们一臂之力，事即可谐。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掩护重庆独立。”言罢当即派第一排扼守东西两寨门，严加防守；第二排与福寿场郑甫臣排就地宿营，暂

时休息，待命行动，阻击清军（及入川的鄂军）。

当时的武器是五花八门的：有九子枪、土毛瑟、前膛枪、洋抬机枪、猫儿炮等，最好的一支枪就是英国毛瑟，这支枪是傅渊希用的。其它有蛇矛、梭镖之类。还有“陆轮炮”、“罐子炮”的炮口对着东西两寨门的来路。第二天，李队官令全队人依高矮次序混合编队，郑甫臣任第一哨官，傅载阳任第二排哨官，张恩普任第三排哨官。每排分为三班，每班设正副目（等于中、下士）各一人。傅渊希任二排二班副目，为什么刚上关口，就要改编队伍呢？乃因来时是五凑六合之故。当时起义军队的编制，只有仿照清军巡防军的称呼来组建，所以也叫队官、哨官、正副目。这就是占领老关口的起义军。队中凡在清军巡防中当过兵的，就派出去侦探敌情。对关口的两寨门不分昼夜地严加把守。那时巴县福寿场冉炳之任管带（等于营长）。这个营还有一个队（即连队）在青木关驻防，也担负阻击清军，掩护重庆独立的任务。

当时，起义同志军身着青布滚身，浑身短打，头缠青布，脚穿草鞋，好似水浒英雄，显得十分威风。

“汉”字旗的作用

巴县园明乡李心田率领的同志军登上了老关口后，撑起两面杏黄大旗，上书斗大的“汉”字，插在两头的关口门显露的地方。李队官派傅渊希的舅父胡映轩专门管理大旗。安排刘均恒同另外两人专门司号，名曰：“过山号”，号声响彻山谷，军威大振。

李队官虽然不懂军事，但却很机警。一日傍晚，他率领队伍从园明场出发去占领老关口，来一次夜行军，悄悄地登上老关口。原来，这是同盟会重庆负责人授予冉炳之管带的任务：“占领成渝交通要隘——老关口，以掩护重庆的独立。占据老关口以后，大张旗鼓地摆出疑阵，以乱清军的军心……。”事出所料，果然清军大为惶恐，据侦察的同志说：“浮图关的‘清军巡防粮子’，当日数次闭城门，不准百姓进城，情况非常混乱。”。次日（11月22日即农历10月2日），重庆即宣告独立。李心田队官得到重庆独立的消息后，马上传遍全队，时全队欢声雷动。李队官集合讲话，告诉大家说：“重庆虽然独立，但成都还没有完全解决，今后对成都方向还须特别注意……”由此可见，巴县同志军占领老关口对重庆独立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当时重庆的清军力量是相当雄厚的，重庆知府邹传善就兼领一支巡防军，并管辖全城的警察队。而川东道朱有基，既有他在重庆的直属部队，又有调动川东道属各地兵力的特权，单是这两个劲敌就难以应付。好在重庆同盟会支部的杨庶堪、朱之洪、张培爵等负责人，在这些日子裏筹谋起义大计考虑周密，布置稳妥：一方面联络工商界的开明人士，筹集经费，以供日益增多的活动开支；另一方面联络会党袍哥中的爱国人士，借其势力，壮大革命声威。况春发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说服了邓昆山，邓便将 he 掌管的枪械的炮针、机柄进行了破坏，减少敌对兵力的威胁。况又捐资组织了三百多人的义勇队，自任教练，为起义夺权打下了基础。再则，结交清廷防军，进行分化瓦解活动，如李湛阳与端方有旧交，端方来川即命李为新巡防军统领，杨庶堪等多与湛阳交往，闻鄂军中潜有革命

党人、即由张颐密访，与鄂军中田智亮取得联系，遂11月27日鄂军在资州（今资中县）杀端方宣布独立之举。当时重庆同盟会支部领导革命主要特点是重视掌握武器和争取外援。在保路运动发生前，就联系了许多会党，以备作为起义时的别动队，又掌握了重庆府中学堂供学生练习军事操练的200多支步枪；同时，派出朱之洪等人来往于成渝两地和各州县之间与同志互通声气，加强联系。及闻任新军十七镇排长的同盟会员夏之时奉命戍守成都龙泉驿，发动驻地新军起义，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有部众千余人并持有新式武器，间道东下过遂宁。重庆同盟会派朱之洪前往洽商，约期在重庆会师。事为邹传善侦悉，将重庆九门紧闭，内外隔绝，因此，朱之洪同张颐缒城而出，迎接夏之时军于浮图关外。归途又说服沿途水陆巡防军，使夏部顺利抵达重庆府城垣。而巴县冉炳之率领的这支袍哥力量，抢先占领老关口和青木关，阻敌于重庆西外防线，这对重庆独立前的军事布署起了积极作用。

11月22日（农历10月初2），在杨庶堪、张培爵、朱之洪等发动组织下，朱必谦身着短装，手提指挥刀，率领学生军到通远门，斩关落锁，迎夏之时部队入城。革命党人、学生队、义勇队、民团、商界、各界代表和人民群众数千人齐往朝天观集会。重庆府知府邹传善、巴县知县段荣嘉被革命党人押至会场，跪地投降，缴出伪印。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大会主席杨庶堪宣布重庆独立，建立革命的蜀军政府。整个山城焕然一新，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等革命标语，家家户户的门上都悬挂着上书“汉”字的白布旗。从此，重庆军政大权遂掌握在革命党

人手中，清王朝在重庆的统治宣告结束。

早年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元帅曾缅怀往事赋诗云：

群众争修铁路权，
志同道合会全川，
排山倒海人民力，
引起中华革命先。

参加四川“保路运动”的回忆

傅 渊 希

八十年前的一九一一年，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这是辛亥革命时期四川最突出的一件大事。

那年十一月二十日（农历九月二十九日）傍晚，巴县园明、福寿两乡的队伍（袍哥队伍）奉令登上了老关口。到达后合编成为一队。园明乡仁字旗李心田当队官（相当于连长）。第一排排长是郑甫臣（福寿乡人），第二排排长是傅载阳（我父亲），第三排排长是张恩普（园明乡人），我则在第二排二班当副目（相当于下士）。我们的管带（相当于营长），就是福寿乡仁字旗冉炳之。

在我们未到达老关口之前，清王朝端方大臣就率领鄂军一协（协等于陆军步兵旅）入川镇压保路风潮。当端方路过老关口向成都进发时，我们就已奉令占领了老关口。我们接受了两个很重要的任务：第一，截断端方后路；第二，等待由简州起义的夏之时排长率领的义军到渝，声援重庆独立。（夏之时是新军十七镇朱庆澜的排长，他起义后深得人心。）十一月二十二日，夏之时队伍到了重庆，于是重庆宣告独立。后端方到达资州，他听说成都的尹昌衡已杀了赵尔丰，此时端方既不能西上，又不能东下，走头无路，终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农历十月七日），被歼灭于资州城内。